

互联网在中国政治领域的应用扩展了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和实践，反映了当下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承载着丰富的政治价值。



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



参与型政治的崛起

——中国网民政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考察

张明新 ■ 著

The Rise of Participant Politics in China: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nternet User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参与型政治的崛起

——中国网民政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考察

张明新 ■ 著

The Rise of Participant Politics in China: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Internet Users'
Political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中国·武汉

内 容 提 要

互联网正以强劲的势头改变着中国的政治进程。本书作者认为,在当今中国,在互联网推动下的政治实践发展和政治文化变迁,具备了现代参与取向的公民文化特质,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型政治”景观。不论是在心理层面还是在行为层面,基于个体层次的调查数据展现了一幅网民参与意识及实践正在勃兴的政治图景。在其中,网民尝试将自己作为社会体系中的一员,借助互联网积极介入和影响公共生活。本书的研究还在网民的政治心理和行为之间确立了明确的因果链条。这些研究和发现有助于人们理解当前网民政治参与行为发生的内在机理,以及深入透视中国网民政治参与的现实面貌和未来趋势。在互联网应用日益深入的背景下,政治参与的剧增要求政府提供有效的制度设计以满足公民政治参与的需要。互联网时代的参与型政治反映了当下中国特有的政治生态,但其本身也存在诸多结构性的缺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参与型政治的崛起:中国网民政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考察/张明新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10

ISBN 978-7-5680-0485-3

I. ①参… II. ①张… III. ①互联网—影响—公民—参与—管理—研究—中国 IV. ①D6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6853号

参与型政治的崛起——中国网民政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考察

张明新 著

策划编辑:姜新祺 杨 玲

责任编辑:封力煊

责任校对:祝 菲

封面设计:范翠璇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1321915

录 排:华中科技大学惠友文印中心

印 刷: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印 张:16 插页:2

字 数:306千字

版 次:201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9.80元



华中出版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序

在人类传播史上,能够生活在今天的信息社会之中,是我们莫大的幸运。从人类出现到语言的使用,几百万年间,人类生活在十分单一的媒介环境中,面对面交流是我们祖先基本的交流方式。到了距今万年左右,由于文字的发明,手书文字成了社会沟通的主要手段。再往后几千年,印刷技术发明,近代报刊问世,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和报纸的大众化进程,人类进入了以报纸为主要介质的大众传播时代。20世纪初期以来,广播、电视相继问世并且迅速普及,大众传播的生态日趋多样化,人类的社会生活空前紧密,大众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传播现象的复杂化,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传播问题、技术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促成了新闻学、传播学的产生,引发了学界对新闻传播现象的理性关注。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兴媒体迅速崛起,新的传播手段层出不穷,传播形式花样翻新,传播模式全然变革,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传播现象,对新闻传播学提出了拓展、创新、变革的要求,这种要求越来越强烈,终于成为当下推动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主要动力。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匀速演进的。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内,历史演进的速度相对比较缓慢,处于渐进的量变之中,令人浑然不觉;而在另一些特别的时间段内,似乎是长期积累的能量得以爆发,历史的演进突然加速,质变取代了量变,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能够实现平时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进步。也就是说,在历史演进途中,关键时刻的一天、一年,其释放的能量可能相当于平和时期的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犹如火山喷发,其瞬间



的能量爆炸性膨胀。由此观之,当今的媒介化时代,可以说是新闻传播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时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这样精彩的传播局面,百花齐放,万物竞生,人们比过去任何时代都耳聪目明,传播对社会生活渗透的深度与广度也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这种新的传播格局,对于今天的新闻传播学界,既是一种机遇,又是一种挑战。

新闻传播学正是在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新媒体迅猛发展、媒介生态格局突变、媒介化社会及数字化生存等因素的牵引下,实现了突破性的发展。就中国而言,一些新的传播现象、一些与传播有关的社会问题、一些与传播直接相连的重大需求,不仅是学界、业界关注的焦点,而且成为执政党和政府机关在顶层设计时优先考虑的对象。新闻传播学科、新闻传播学各大研究领域、新闻传播教育界,从社会、业界、政府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资源。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展现出显学的姿态。在这一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界人才辈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新闻传播教育也蒸蒸日上。大部分“985”、“211”大学都开设了新闻传播学相关专业,进行本科、硕士甚至博士阶段的人才培养。所有这些,都表明新闻传播业、新闻传播学、新闻传播教育在 21 世纪初这个人类新闻传播史的关键节点上,焕发了空前的活力。

一个学科的发展,往往是与一批杰出学者的涌现分不开的。而这些学者的崛起,又得益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的滋养。20 世纪中期以来传播学的勃兴,既是那个时代传播发展的产物,又是那个时代一批杰出学者贡献的结晶。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宣传分析、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的传播效果理论、社会心理学家库尔特·卢因的“把关人”理论、实验心理学家卡尔·霍夫兰的说服研究,以及威尔伯·施拉姆的集大成……没有他们的创造性贡献,就不会有今天蔚为大观的新闻传播学体系。

如今,世界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又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新的数字技术带来不胜枚举的新兴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共生的格局面临着各种新的问题,传播手段、形式的变化带来的传播模式变化,媒体融合背景下专业人才需求的演变,媒体融合时代传统媒体的生存与发展战略,网络化时代的传播自由与社会责任,新的媒介格局决定的社会变迁,全球化语境下国家软实力建构与传播体系发展,等等,这些

问题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所能完全解释的。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本身需要突破,需要新视野、新方法、新理论,需要拓展新的思维空间。这种需要对于新闻传播学而言,是一种巨大的推力。在它的推动下,新闻传播学才有可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新的超越。这一切都有赖于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杰出学者群体的崛起。而在科学探索方面,最富有创造精神的是新锐的青年学者。因为他们没有包袱、没有负担,视野开阔,思想解放,勇于进取。正是基于对学科责任的认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决定与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这套“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

“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第一批收入十二本专著。包括郭小平博士的《环境传播:话语变迁、风险议题建构与路径选择》,闫隽博士的《贸易政治的媒介镜像》,刘瑛博士的《互联网健康传播: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邓秀军博士的《纪录片叙述者的主体性研究》,牛静博士的《媒体权利的保障与约束研究》,鲍立泉博士的《技术视野下媒介融合的历史与未来》,周婷婷博士的《中国新闻教育的初曙——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为中心的考察》,李华君博士的《政府公关传播:形象塑造、公众沟通与媒介框架》,徐明华博士的《全球化与中国电视文化安全》,刘锐博士的《信息监控与网络治理:社会化媒体实名制研究》,于婷婷博士的《网络购物行为研究——基于在线互动与感知价值的实证分析》,张梅兰博士的《隐喻:在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叙事中完成》。“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第二批将收入两本专著。包括张明新博士的《参与型政治的崛起——中国网民政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考察》,曾一帆博士的《企业家沟通策略研究》。这些著作既有对新闻传播历史和理论的探讨,又有对当下新闻传播实务变革的深入研究;既涉及传统媒体,又关注了网络新媒体带来的新变化;既有基于政治视角的分析,又有基于产业经济视角或文化视角的探究;既立足于国内新闻传播的历史与现实,又有全球视野的观照。这些著作无一例外,大多是以作者原来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再思考,在大幅修改、补充的基础上完成的。其作者大多是近年来从国内外著名高校引进(或选留)的博士生、博士后。他们虽然在学历背景、专业背景及从业经历上不尽相同,但是出于对新闻传播、新闻传播教育的共同兴趣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从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专业走到了

一起,成为同一命运共同体的成员。

这套论丛的公开出版,一方面,对于上述青年学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他们过去虽然发表了不少论文,在学术界已小有名气,但是独立地出版专著大多还是第一次。这些著作不仅比较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们对复杂的新闻传播现象的独特理解,展现了他们不俗的才华和天才创意,还显示出他们广博的学科视野、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学术素养,更标志着他们学术生涯中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另一方面,对于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来说,也是对学院青年新闻传播学者研究实力的一次集中展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创建伊始,就坚持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尤其将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重中之重。近十年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新补充的师资基本上来自校外,是业界的精英,是来自国内外其他知名高校的优秀博士、博士后。来自五湖四海的学者,怀抱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兴趣,将不同的专业、学历、经历融汇于一炉,形成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包容多元、兼收并蓄、开拓进取、锐意创新的文化传统。这套论丛的公开出版,乃是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办学理念的具体体现。

第一批“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正式付梓时,正值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创办三十周年的前夕,也是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向华中科技大学奉献的一份厚礼。三十而立。这三十年的历程,实在是不平凡。三十年前,华中工学院(华中科技大学的前身)领国内工科院校风气之先创办新闻学系(专业)时,新闻学系(专业)在校内是唯一的文科专业,白手起家,只有单一新闻学本科专业;如今,在人才培养方面,本科层次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学、传播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五个专业,硕士研究生层次,学术硕士方面有新闻学、广播电视学、广告与公关、传播学四个硕士点,专业硕士方面有新闻与传播、出版两个专业硕士点,博士研究生层次有新闻学、传播学、广告与传媒经济、广播电视与数字媒体四个博士点。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国家级特色专业、一个国家级校外实践基地、一门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一门国家级精品课、一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科学研究方面,三十年前的华中工学院新闻学系(专业),教学是重中之重,科研仅仅体现在教材编写上;如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是国内新闻传播的学



术重镇,截至2012年年底,学院不到40人的学术团队仅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课题就有15项,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课题2项,还有2项教育部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工程教材)。学科建设方面,三十年前,华中工学院新闻学系(专业)只有本科、只有教学,根本谈不上学科;如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是国内较早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还拥有—个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新闻传播学科还是湖北省一级学科重点学科。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在学界、业界都得到了正面的评价。今天这套“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的问世,更是彰显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活力。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曾感化教育了几代中国人。“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每读及此,我都热血沸腾,不能自己。如果把这段话置于科学发展的语境,同样也是适用的。新闻传播学科是一个年轻的充满生机的学科领域,它的永续发展,也需要青年的朝气与活力。只有造就一支强大的青年学者队伍,充分激发青年学者的潜力,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才会有源源不竭的动力。虽然我已经不再年轻,但作为过来人,我深知青年学者们正是需要社会支持、帮助的族群。我们应当想方设法为青年学者的成长创造各种必要的条件,要努力营造出宽松自由的环境,要尽量解除束缚他们想象力、创造力的物质和精神障碍。

“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国家“985”工程建设项目的资助。由于学界同仁的鼓励及学校领导的支持,以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传播学科为主体的“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基地”得以在华中科技大学“985”三期建设工程中单独立项。其次,还要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是出版社总编辑姜新祺教授及相关责任编辑,他们为这套论丛的策划与出版费尽心力。当然,我

们还要感谢这套论丛的各位作者,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耕耘,我们才得以享用这份精美的学术大餐。

我们期待着“新锐新闻传播学者论丛”的出版能够给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带来新的正能量;期待着这套论丛的问世,能够引起中外学界、业界的正面回应;期待着这批青年学者能够再接再厉,在科学思维和学术探索方面攀上新的台阶、进入新的境界。

张 昆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新闻传播学科组成员

2014年1月20日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和媒体	/1
第一节 中国政治文化与实践:传统和当下	/2
一、中国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延续与变迁	/2
二、1978 年以来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特征与解释	/6
第二节 传统媒体、互联网与民众政治参与的变迁	/17
一、公民政治参与中的媒体角色	/17
二、中国网络政治参与的洪流	/24
第二章 “参与型政治”的理论来源与内涵	/37
第一节 政治参与和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37
一、作为行动或实践的政治参与	/37
二、作为意识或观念的政治文化	/40
三、公民文化作为一种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43
第二节 “参与型政治”的内涵	/46
第三节 “参与型政治”何以可能?	/51
一、互联网作为赋权手段	/52
二、互联网作为政治机会结构	/54
三、互联网作为动员结构	/56
四、互联网作为政治社会化渠道	/59
第三章 研究框架与研究数据	/61
第一节 研究框架	/61
第二节 研究数据	/64

一、数据来源	/64
二、样本概况	/68
第四章 网民政治参与的认知层面	/73
第一节 网民对互联网政治功能的认知	/74
第二节 互联网作为网民的政治认知渠道	/78
一、媒体接触和新闻性接触的整体状况	/78
二、互联网政治信息接触的多样化面貌	/82
三、网民基于互联网的重要时政议题认知	/86
第三节 网民政治认知中的关注度与精细加工	/88
第四节 互联网环境下各政治认知变量之间的关系	/92
第五章 网民参与中的政治效能感	/99
第一节 政治效能感的概念及其结构	/100
一、政治效能感为何至关重要	/100
二、政治效能感的概念与结构	/102
第二节 中国网民的政治效能感	/105
一、三种政治效能感的水平	/105
二、三种政治效能感的比较和相互关系	/111
第三节 政治认知因素对网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116
第六章 政治信任：网民政治参与的情感要素	/121
第一节 政治参与中的情感因素与信任	/122
一、政治情感的概念及其在政治参与中的作用	/122
二、政治信任作为一种政治情感	/125
第二节 网民政治信任的现状：多重指标分析	/128
一、总体政治信任指数	/128
二、党政机构信任指数	/130
三、官员不信任指数	/133
第三节 互联网政治认知与政治信任的关系	/137
第四节 网民政治不信任的网络表达	/142
第七章 “无形的政治”：表达作为政治参与行为	/153
第一节 表达性政治参与与网络空间的政治表达	/154
一、政治系统论中的表达性政治参与	/154



二、中国网络空间的政治表达:控制与反控制	/156
第二节 网上政治表达的水平、活跃者与沉默者	/162
第三节 网上政治表达的动力与阻力	/169
第四节 网络空间的民族主义表达	/174
第八章 网民的政治讨论:水平、网络与决定变量	/181
第一节 政治讨论的民主参与意涵及其 在网络环境下的发展	/182
一、政治讨论的民主参与意涵	/182
二、网上的政治讨论:在商议民主视野下解读	/185
第二节 网民政治讨论的水平与网络	/188
一、网民政治讨论的水平:现状与比较	/188
二、网民政治讨论的网络:规模与结构	/193
第三节 网民政治讨论的决定变量	/197
第九章 网民的政治参与:现状描述与解释模型	/205
第一节 互联网时代的公民政治参与	/206
一、政治参与的概念与范畴	/206
二、互联网环境下的政治参与	/211
第二节 网民政治参与的基本现状	/215
一、自动参与	/216
二、动员参与	/222
三、积极参与者的规模与特征	/225
第三节 网民的政治认知、表达、讨论与参与: 构建因果模型	/228
第十章 研究结论、讨论与展望	/237
一、研究结论	/237
二、讨论与展望	/239
后记	/245

第一章

中国的政治文化、政治参与和媒体

传统上,中国的政治文化是典型的臣民型文化,民众素来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能力和意愿。自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尤其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民众参与政治的机会和实践固然大为增加,但革命型的政治文化并没有在实质上提升人民参与政治的自主性。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控制有所放松,民众权利意识逐渐增强,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孕育和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机会有所增加,但由于受到体制因素的限制,人们政治参与的程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人既是社会人,更是“政治人”^①,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具有政治属性。伴随着政治现代化的发展,公民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扩展,以及效能的提高是一种必然趋势。研究表明,当今的中国民众不仅对政治有较强的兴趣,对民主参与的理念也相当认同。^②因此,在权威体制的局限和政治参与的诉求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的紧张。自1990年代以来,这种张力逐步积累,并不断演变为大量具有相当破坏力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

近年来,互联网在我国的应用快速发展,成为释放这种结构性紧张的渠道。伴随着网民数量的急剧膨胀,以及互联网在政治领域应用的深入,民众政治参与的格局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一股急剧增长的政治参与的洪流正汹涌而来,并开始塑造一种全新的政治文化。这种在互联网推动下的政治实践和政治文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现代参与取向的公民文化(civic culture)的特质。笔者认为这是一种参与型政治现象的崛起。

① 如以下文献,都将特定政治系统中的公民视为“政治人”,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马超华:《政治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陈义平:《政治人:模铸与发展——中国转型期的公民政治分析》,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张明澍:《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Jie Chen, Yang Zhong. Mass Political Interest(or Apathy) in Urban Chin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9, Vol. 32: 281-303; Yang Zhong. Political Culture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PS, 2004, pp. 445-453.



本书的目的是从政治心理和行为两个向度,以实证分析的方式揭示当前中国网民政治参与的心理文化特征与现实表现,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多重因素。对于这种参与型政治的深入研究,有助于理解当前网民在线上和线下参与公共生活的政治实践,也构成理解当前我国处于转型中的政治文化的关键所在。迄今为止,由于这方面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亦未成体系,本书的研究对于积累这方面的基础性实证资料,特别是对于理解当前中国网民的政治观念和参与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第一节 中国政治文化与实践:传统和当下

一、中国传统的臣民政治文化:延续与变迁

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非参与性的政治文化。在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传统的思想不主张人民对政治发生兴趣。封建王朝的政治文化直接服务于王权的维系和传承。白鲁恂(Lucian Pye)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具有典型的臣民文化特征,表现为王权主义孕育出遍及全社会的权威崇拜,这种崇拜甚至达到极端化境地,使个体的独立个性和政治自主意识近于泯灭。当臣民意识深深根植于人们的政治意识中,公民意识便非常缺乏。^①

在我国封建专制社会,参与到政治系统中统治国家的主要是知识分子及乡村绅士阶层。在这种精英阶层统治的社会,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市民处于社会底层。按照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的“政治系统理论”(political system theory)^②,被统治阶层在绝大多数情形下只可能是政治系统输出(output)的政治信息的被动接受者,个人的政治意愿很难输入(input)到系统中,几乎被排斥在政治过程之外。同时,民众参与政治的渠道极为狭窄,一般百姓很难对政治系统输入个人的诉求和观点。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这样描述传统中国的政治运作:

^① Lucian W Pye. The dynamics of Chinese politics, Cambridge: Oelgeschlager, Gunn & Hain, 1981.

^② 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

必须有参与政治的人——至少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宫廷是这样。也必须有服从的人,成为忠实的服从者——至少贵族和商人是这样。没有参与,就没有国家。农村大众可以是地区型的,只有极少的忠诚感、服从感和政治参与。这就是传统中国的图景:80%的人口是农民,运转这个国家的是一个绅士和商人阶层,人数更少的行政官员和宫廷官员在监管着帝国。^①

在研究西方民主国家的公民文化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等将屈从或者只是被动地不屈从政府机构法令和规章的人民定义为“臣民”(subject)。1950年代末,他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对美国、英国、西德、意大利和墨西哥五个国家的5000名公众展开调查,根据被访者政治心理倾向性,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三种类型: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公民文化,又分别称为地域型、依附型和参与型政治文化。^②在臣民政治文化下,公民认为自己政府对产生影响的有限,易于服从,政治参与消极;表现在认知和态度层面,虽然个人对政治体系的结构、权威、规范及自己在体系输出方面的责任等有一定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取向,但对于政治体系的输入取向,以及社会成员作为政治参与者的自我取向却非常低。

臣民文化是一种具有明显奴性特征的政治文化,它缩小甚至根本否定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同时无限放大君权或王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臣民政治文化具有根深蒂固的基础。“中国人的思想活动,乃至他们的整个人生观都拘囚锢蔽在官僚政治所设定的樊笼中”。^③在臣民政治文化的世代延续中,民众形成对权力的依附、臣属和顺从,缺乏自主独立和民主意识,以及权利观念和参与意识。

在我国,臣民文化表现为权威主义和等级观念,根源是父权制的宗法政治关系。“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无条件服从绝对权威的观念被人们接受并深入内心。父为子纲,民(父)受官吏管辖,百官服从皇权,皇帝则“听命于天”(见图1-1)。长期以来,“支配—服从”的主从关系的固化,形成中国人的权威主义人格特征,导致特殊的权力崇拜心理和人身依附意识。

① 米切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林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② 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等:《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0页。

③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图 1-1 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支配与服从关系^①

在传统中国,臣民型政治文化在封闭与排异中高度稳定地代代传承,形成封建时代专制政治文化的基础。包心鉴先生曾指出,在我国政治发展中,虽然没有成套的西方社会那样的精英政治理论,但由于崇尚家长,崇尚皇权,崇尚权威的封建专制主义影响极为严重,因而实际上精英政治理论有着极为广阔的社会基础,精英政治意识严重地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②

一方面,以对权威的崇拜和服从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臣民政治文化,体现的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政治哲学。^③在政治心态方面,民众形成了附庸意识和卑微心理,“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干于我”,这是一种消极的政治心理;另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垄断国家政治资源,民众既无参与政治决策的渠道,也无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普通民众作为“子民”,不成其为政治主体。^④因此,在传统中国,普通民众积极自主的政治参与行为根本不存在,这在客观上为统治阶级实施愚民政策提供了条件。王绍光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视为“义务本位的文化”,强调人们应尽的义务,而不是应该享受的权利;“在这种整体本位和义务本位的文化里,民众的利益表达和参与显然没有一席之地”。^⑤

许多政治学者认为,直到今天,臣民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很明显,占很大比例的公众缺乏主动参与公共生活的意识、热情和必需的资源,他们认为公共事务的决策是政府官员的事情,即所谓“肉食者谋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现代社会的民众已不再是封建专制社会中的“臣民”,而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

随着历史的发展,臣民政治文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公民政治参与的意识 and 能力在不断提升。晚清以降,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西方的政治制度开始逐步推行,“权利”观念带入中国近代的政治文化体系,“民主”话语也迅速形成。

① 戴长征等:《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年版,第 335 页。

② 包心鉴:《论现代政治发展中的主体意识》,载《求索》1989 年第 33 页。

③ 张纯明:《中国政治二千年》,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年版。

④ 王明生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 150 页。

⑤ 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 4 期,第 95-112 页。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的建立,在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上,民众的臣民身份被极大地消解,政治斗争的广泛性和激烈程度也为民众在各种政治参与活动中提供了成长的机会。^①

王绍光教授认为在清末民初,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一并开始发生松动。当时,传统政治文化对大众参与的敌视受到撼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则开启了较大范围内的民众政治参与局面,出现了农民运动的几次高潮。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其控制区鼓励人民政治参与的愿望,并建立各种机制,为人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有效途径。^② 在这段历史时期,臣民政治文化处于民众政治参与的强烈冲击之下。可以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民主、共和以及革命价值取向占据了人民政治观念的重要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到1978年,经常性的政治运动成为群众参与政治的特殊形式。群众运动持续不断,工人、农民阶层参与政治的机会达到了历史最高点。有政治学者将此阶段民众的政治参与称为“倒政治参与”。所谓“倒政治参与”,指参与不是社会和公民从外部对政治体系的介入,而是政治体系通过自我扩大,把社会和公民纳入进来。^③ 倒政治参与现象是当时“总体性社会”这一历史事实下的直接产物。在其中,资源和权力高度集中,社会处于国家的严密掌控之中,政治力量全面介入和渗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国家虽拥有很强的动员与组织能力,但社会自组织的功能趋于瘫痪,社会结构陷于僵硬。^④

但也有学者将1949—1978年国家动员下的政治文化称为“革命型政治文化”^⑤,即在革命政治的状态下,把人们维系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当中的政治价值观念,以及人们在政治体系中所呈现出来的普遍观念、准则和行为状态。这些学者认为革命型的政治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1950年代后期至1960年代初期,以及“文革”期间,依次经历了从发挥积极作用、趋向偏激丧失合理性,最终达到畸形流变顶峰的阶段性演变。

以上论述表明,臣民政治文化是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最重要特征,崇拜和服

① 王明生等:《当代中国政治参与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页。

② 王绍光:《政治文化与社会结构对政治参与的影响》,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③ 陶东明、陈明明:《当代中国政治参与》,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④ 孙立平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第50页。

⑤ 袁莉莉:《1949—1978年中国革命型政治文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